人民美術出版社
双月
2007 1

中国画研究

中国国家画院 编

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为中国国家画院揭牌

卷首语

去年岁末，整整走过25年辉煌历史的中国画研究院，在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被正式批准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并于2006年12月1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正如孙家正部长所说："这是我们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结果。"标志着国家对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视，体现了国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我院将以更高的姿态，更高的标准，与全国的美术家一道，承担起中国美术事业繁荣进步的文化使命。本期特别刊发原中国画研究院第一届院委的作品，以缅怀他们对我院的贡献，并配发了有关古代画院的文章。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地变迁，各种思潮迭起，传统的中国画在形态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表现形式此起彼伏，中国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问题也同时显现出来。中国艺术家赶上了近现代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时代呼唤精品力作，政府应大力扶植与引导艺术市场的导向。当前艺术市场的繁荣产生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本期刊发有关赖少其与吴一峰的介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老一辈的艺术家，所处的创作环境与条件远不如当代的画家，他们把艺术作为毕生的追求，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在极为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们对当代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应该有所启迪：是否可以更理智地面对当代艺术市场的诱惑。

清初海禁时期浙江画家渡日活动频繁，受当时渡日画家的直接影响，在日本形成了"南画画派"，对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书写了中国画对外传播的故事。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画，是我们应了解与关心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更能看见我们自己不常见或视而不见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居翰的文章可以为我们换一视角。中

龙瑞

中国画研究
ZHONG GUO HUA YAN JIU
2007年 第1期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迎春　龙　瑞　邓　林　邓嘉德
卢禹舜　李延声　李宝林　邬鸿恩
张江舟　程大利　赵力忠　赵　卫
曾来德　梅墨生　谢志高　舒建新
解永全　詹庚西

主　编／龙　瑞　程大利
副主编／卢禹舜
执行副主编／邓嘉德
执行编辑／李晓军
设　计／蒋玉强
编　务／王　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研究. 第3期／龙瑞主编.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ISBN 978-7-102-03838-4
Ⅰ.中…　Ⅱ.龙…　Ⅲ.中国画－研究　Ⅳ.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2345号

中国画研究　2007年第1期
编　　者：中国国家画院
出版发行：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徐永林
审　　读：夏　丽
校　　对：胡文涛
责任印刷：孙建虎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大16开
印　　张：8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978-7-102-03838-4
定　　价：45.00元

焦点论坛 4
栏目主持　徐沛君　付京生
国画家 22
栏目主持　冬　青
史与论 46
栏目主持　魏广君
画院巡礼 68
栏目主持　冬　青
中国画与世界 102
栏目主持　李晓军

目录

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文/4

中国画繁荣背后的隐忧及对策
文/冯 远/10

中国画的现状与思考
文/刘曦林/14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画传统
文/张志伟/18

大道通天
评赖少其晚年的山水画及其“丙寅变法”的历史意义
文/刘传铭/22

走近吴一峰
文/刘欣 江功举 整理/34

从辉煌到没落
中国古代画院发展流变考
文/王雪芹/46

简论诗歌与绘画的关系
文/王永亮/62

中国国家画院院藏原中国画研究院第一届院委作品选
文/李晓军/68

1981～2006中国画研究院纪略（三稿）（下）
文/赵力忠 整理/90

清初海禁时期的浙江渡日画家活动
文/任道斌/102

中国绘画史的“终结”？
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观及其引发的争论
文/黄小峰/11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

陈至立张思卿出席揭牌仪式 孙家正做重要讲话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于1981年。25年来，为中国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实际贡献。更名后的中国国家画院，将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方向，主要职责为：开展国画、书法、篆刻等艺术的创作、研究以及展览、收藏工作；承担国家重大美术课题及国际性国画创作、研究任务；开展国内外相关艺术和学术交流工作；开展国画、书法、篆刻等艺术的教学培训等工作；承担文化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日前，整整走过了25年辉煌历程的中国画研究院，在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被正式批准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12月14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出席仪式并共同为中国国家画院揭牌，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发来贺信，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做了重要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陈进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黄耀金、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晓光主持揭牌仪式，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做了发言，中国美协副秘书长戴志祺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大为致辞。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人员、文化艺术界代表150余人，共同见证了当代美术事业发展中的这一重要事件。

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及有关人士参加了揭牌仪式。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国家画院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对于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体现了国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

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是在1981年正式成立的，它的成立，不仅得到了一批艺术大师、书画名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也得到了当时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叶剑英、余秋里、谷牧、万里、方毅等同志的重视与关心。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画大师、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25年间的中国画研究院汇聚了一个时代的中国画艺术精英，团结了老中青三代知名艺术家，成为了新时期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创作、研究中心。

现任院长、著名山水画家龙瑞先生针对画院建设提出“发展中国画一定要贴近中国文化的文脉”这一口号，使得目前丰富复杂的国画事业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引起了业内的积极响应。更名后的中国国家画院以创作、研究中国画、书法、篆刻等艺术为主要职能，立足民族性和传统性，弘扬传统艺术文化，在继承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力争多出好作品，多出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

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主席台现场

孙家正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陈至立国务委员、尊敬的张思卿副主席、各位嘉宾和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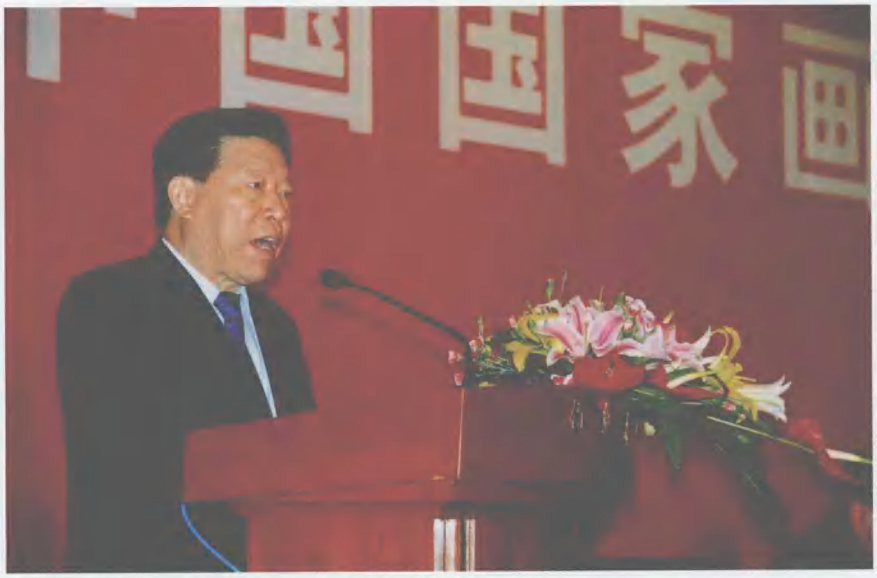
同志们、朋友们：

上午好！

今天中国国家画院在这里举行揭牌仪式，我谨代表文化部向中国国家画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今天揭牌仪式的领导同志、向各位艺术家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借此机会向为我国美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广大美术工作者致以诚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中国国家画院是在原中国画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的，这是我们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结果。中国画研究院25年的发展历程，正是我国美术事业波澜起伏、探索前行并不断走上繁荣发展的25年。25年前，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为新时期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一大批老艺术家齐聚在中国画研究院的门下，开始了中国美术的新的航程。

25年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画研究院与中国美术家一道，满腔热情地迎接改革开放新的时代。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保持着民族的清醒和自信，坚守民族文化的根基和传统，抵御西方一些错误的腐朽思想的冲击，抵御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始终坚持民族文化立场，以继承发展中国画艺术为宗旨，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方向，以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为己任，努力钻研，不断探索，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为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国家画院的成立必将对我国美术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事业的繁荣是小康社会的重要



孙家正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上讲话

标志，是和谐社会基本的内涵和文化基础。美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全局。在当今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美术事业应该承担起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品格，表现时代风貌，抚慰人类心灵，创造和谐氛围，为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精神动力的文化责任。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做了重要的讲话，要求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努力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说今天的美术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个事业发展的大好机遇，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把握先进文化方向的能力，掌握艺术发展自身规律的能力，提升创作水平的能力，深化学术研究的能力，开展中外艺术交流，充分发挥美术创作与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画院的成立不是一件简单的名称更替，而是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平台。希望中国国家画院全体同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将中国国家画院建设成全国美术创作研究的中心、美术教育培训的中心、中外美术交流的中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修养，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倡导真善美，坚守职业道德，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创作出以表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画卷，与全国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一道，共同为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与进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祝愿中国国家画院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祝愿我们的社会主义美术事业更加繁荣发展。

谢谢大家！

刘大为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仅对中国画研究院的各位同仁很重要，对我们的国画界乃至整个中国美术界也同样重要。所以，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这里，我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也代表全国的美术家向中国国家画院的同仁们表示祝贺！

中国画研究院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专门从事中国画研究与创作的学术机构。那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一切都百废待兴，画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中国画研究院产生于这样一个“文化复兴”的大潮之中，肩负着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画研究院自成立到今天，已走过整整25个年头，这2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25年，也是中国艺术大繁荣的25年。中国画研究院发展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并证明了中国艺术在当代的繁荣。

今天，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个专业艺术机构的更名，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国家画院的诞生，首先是一个标志，它结束了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家，进入到现代之后，一直没有国家画院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形象日益提高，受之鼓舞，民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情日趋高涨。美术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样的时局下，中国国家画院宣告诞生，恰逢其时，它是时代的需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祝中国的艺术事业繁荣昌盛。

谢谢！

龙瑞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

在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文化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为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做

龙瑞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上发言

前院长李可染夫人邹佩珠（中）参加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

出了突出贡献，整整走过25年成长历程的中国画研究院已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这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美术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时值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之际，我仅代表中国国家画院全体同仁，向长期以来对我院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上级领导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以来为我院学术建设给予积极合作与支持的文化艺术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揭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同志、各位嘉宾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知道，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1981年，在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万里、谷牧、姚依林、方毅等同志的热心支持下，在文化部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画研究院得以成立。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为保护和挽救中国画艺术，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李可染、蔡若虹、叶浅予、黄胄、何海霞等一大批美术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齐聚中国画研究院门下，为中国画艺术的进步，融古开今，辛勤工作。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们对老一辈的艺术家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25年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美术事业开始了曲折艰难的当代发展历程，从对民族传统的质疑、对西方文化的盲从到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高扬，中国画研究院始终站在中国画艺术的学术前沿，审时度势，锐意创新，其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积极的学术作为，为保护新时期中国画艺术的健康发展，为促进当代中国画艺术的繁荣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近年来，我院依据当前中国画发展现状，提出了“正本清源，贴近文脉，开拓创新”的积极学术主张，并通过一系列的课题研究、创作实践、展览交流和教学培训，为深化中国画的学术研究、学术进步，发挥了国家专业机构的积极作用。

25年的成长历程，为中国画研究院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更名后的中国国家画院，将开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绘画艺术新的历程。

当前，国家昌盛，民族复兴之声日隆。跨越了20世纪的中华民族正在昂然崛起。泱泱大国，正以其不断强大的综合实力，阔步于世界舞台。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精神文明进步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务和要求，文化事业迎来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机。文化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一道，共同承担着民族崛起、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中国国家画院应国家昌盛之运而生，顺民族复兴之势而立，它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繁荣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就有重视人文教化和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中国画院体制远在北宋已有规模庞大的

国务委员陈至立（左二）、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右二）、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左一）、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右一）在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后合影

“翰林图画院”，也就是俗称的“宫廷画院”。于是绘画艺术昌明，历朝历代大师辈出，精品佳作不断，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之辉煌。当然，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将成为实现国家宏观文化战略服务的艺术专门机构。

在当前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作用愈显重要。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画艺术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终极精神追求的大美境界。它所唤化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之境，正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精神之源。因此，继承和发展中国画艺术，努力发掘和弘扬中国画艺术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正逢其时。一个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和谐内涵的中国画艺术，必将融入壮阔的时代文化大潮，构筑起当代中国和谐文化的历史回响。

告别昨天，迎接未来。更名后的中国国家画院，将以更高的姿态、更高的标准，与全国的美术家一道，承担起中国美术事业繁荣进步的文化使命。

抚今追昔，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正确文艺方针指导下，在各领导部门和全国广大美术家的关心支持下，我们的艺术事业将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国画繁荣背后的隐忧及对策

冯 远

齐白石《牡丹图》

编者手记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迁，传统的中国画在形态学意义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思潮迭起，各种风格此起彼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取法多元而风格各异的艺术生态形成以后，传统的中国画在形态学意义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问题也同时随之凸显出来。

冯远先生著文《中国画繁荣背后的隐忧及对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长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艺术家赶上了近现代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所以呼吁精品力作已迫在眉睫，而从发展战略高度思考中国画的精品力作问题，首先，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光是靠号召所能解决的，它还需要一个积累扶植的过程；此外，西方国家的艺术界同行对中国艺术的认识，远远不如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研究、了解得多和迫切，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应加大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的力度。最后，冯远先生认为，目前，需要警醒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及艺术界的领导要把握好艺术市场的导向，避免不正常的市场导向影响中国画的健康发展。

刘曦林先生的《中国画的现状与思考》认为，当前中国画多样化或多元状态的具体体现，一种是主流文化，表现在对现实、人生、历史、自然的关注，在全国性展览中展出的作品，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可能缺少经典性作品；一种是学院文化，讲究技巧，仿佛高高在上，对中国画发展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另外一种，是现代形态的或者后现代形态的各种各样的新潮的、抽象的、表现的、观念的艺术对中国画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种是传统文化，以新文人画为代表，推崇养生文化、食色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曦林先生认为，思考中国画的现状，有如下问题必须注意：一、生态环境与画家自处；二、中国画论争的继续与演化；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宏观课题；四、中国画的多种流向；五、中国画的文化现象与问题。

张志伟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画传统》，认为艺术批判的媚俗化，是影响中国画健康发展的大敌。要抵御与批判传播媒体的媚俗化倾向，就应该从正常的批评开始。这里要做的，首先是在艺术家群体里确认批评家的价值，努力扩大批评家的队伍，而不只是扩大艺术家队伍。扩大批评和鉴赏教育，而不只是扩大艺术技巧教育；其二是在批评家中间展开关于批评立场的讨论，目的不是为了强求批评家立场的一致，而是使每一个批评家都能够明确自己的批评立场，使艺术家清楚谁能为自己的艺术辩护，而不必与不认同自己艺术的批评家合作，产生双方的尴尬。更不至于有些批评家总是糊里糊涂的，拿对方的理由为自己的立场申辩；其三是扩展中国画的批评范畴，而不只是扩展中国画的图像范畴。以使中国画艺术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得到真正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进一步被西方文化殖民。

总之，中国画繁荣背后的隐忧及对策，不仅仅是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事情，对一个有历史责任感、有社会责任心的画家而言，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同样是不无裨益的。因此，编发如下稿件，以飨读者。（付京生）

李斛 《关汉卿》 85cm × 60cm 1962年
纸本设色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田黎明 《西藏阳光》 70 × 46cm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国家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并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大政方针的推行，中国艺术家赶上了近现代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如果今天的艺术家拿不出好作品，那就只能从其自身找问题。

我认为从宏观的历史文化发展层面来说，确实需要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紧迫感，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充分认识到我们所担当的文化使命，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推动并迎接中国文化新的高潮的到来。

中国画的当下状态，从整体格局来看，正处于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例如中国画创作展览活动的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各地的美术馆建设正进入一个初级的良性发展的阶段；我们美术人才的培养、美术院校的招生数量以及每年的应届毕业生的绝对数量，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年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美术交流，也是历史上最活跃的；加上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整个中国画艺术的繁荣，此外，再算上中国画艺术的社会普及教学，为企业文化建设服务，为社区服务，为扶贫农村服务，各种捐赠活动等等，从状态上来说来，中国画正面临着历史上所没有的局面，但是每一个繁荣背后也都存在着隐忧，例如我们的展览数量是大大丰富了，但作品量大于质；美术馆方面，不管是国家投入还是私人投入的，在馆舍建设、管理、规范和使用有效方面，还需要改进；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多数量的专业院校和学科，最大的招生数量，最庞大的美术从业人员，我们整个美术创作研究活动的普及化，数量大大增长，而优秀的、突出专业学术性质量的还不够多，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唤精品力作，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光是靠号召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积累扶植的过程。

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重头戏少，进入对方主流社会的少，艺术市场方面，不规范运作和有序管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等等，我觉得除以上诸方面需要逐步改进外，有两件事需要常抓不懈，一个是把抓好作品作为长期任务，因为任何一个艺术种类的发展，不是简单地靠理论的号召，开几次会，办几次活动，做几个展览，出几本书就能奏效，最终是要靠实践成果来体现的。

目前，许多艺术家每年需要应付大量的活动，耗费大量时间，反而难得花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打磨一件精品力作，真正拿出一些代表自己的学术价值、艺术语言创新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基础繁荣了，普遍提高了，怎样抓住这个时代认可的好东西，再提升一步，这些年社会多个方面为此都做了大量的积极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很好

刘文西 《祖孙四代》 119cm × 97.5cm 1962年 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龙瑞 《开元古塔》 266 × 132cm 2003年

张江舟 《人物写生》(局部)

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有针对性的、有组织的做好这些工作，还是显得有些薄弱。第二，西方国家的艺术界同行对中国艺术的认识，远远不如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研究、了解得多和迫切，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我们要依托国家实力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加大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的力度，加大这块工作的力度，是必不可少的。光是我们认为中国画艺术价值如何高，是不够的，而是要让世界更多的人知道其价值。中国画要用最大的努力，尽最大的可能把精华宣传出去，让更多的西方艺术史家、艺术同行来了解，认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义和崇高地位，以此获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应有的评价。

要做大宣传首先要有好东西，从创作到理论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观的。但这中间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下深入梳理。我们有一支非常强大的中国画创作队伍，能不能有一批人静下心来在研究实践方面，做好这个学问。例如研究经典艺术，这是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从绘画切入，不管它是水墨画、彩墨画、重彩画等形式，都要把学问做进去。

一个是从传统打出来，一个是从绘画进入反向弥补传统。我觉得这是中国画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对于兼容型，真正能够在当代的中国画创作中，在艺术创新、风格、形式语言技术方面兼融并出一点新确也不容易。前些时日，我们在参观工笔画大展的时候，听到同行议论，中国工笔画的技术已经穷尽了，意指彼此之间缺少一种语言风格的反差，技术虽有翻新，但多雷同，作为观点可以争论，但在这背后潜藏了一个什么问题？每个艺术家在寻求自己艺术创作风格的过程中，目标不是很清晰，互相借鉴变成互相干扰，最后演变为一种灾难性问题。

我认为，得兼容之中也要有所选择，以便各自按照学术研究方向，做出特色。

第三，我以为中国画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惯常的理论实践思维中，中国材料能不能做一些改革？宣纸、毛笔、墨等，任何一种材料的变革，会引发一系列有关观念和审美价值标准的变化。能不能也有一部分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走出一点不一样的路，这样不同的路向，使得我们中国画在今天的发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对于有成果有建树的艺术理论家、实践家，或是担当了艺术机构的负责人而言，我觉得中国画批评的声音要加强，要有一些尖刻犀利、芒刺在背的声音，要有一些有痛感的文章。大家繁荣，你好我也好，虽其中各有苦衷，但批评的声音得不到加强的话，对实践发展、理论指导创作实践是有害的。

当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但我还是要呼吁艺术家，都来关注理论，参与批评，艺术为天下公器，谈观点不指涉人，这样才可能使得我们的批评更到位，兴利除弊，这样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空泛的概念争论。百年之后，后人拿什么来研究中国画当代史的发展，是靠

刘进安　《云间人世》　128 × 41cm
纸本设色　1996

一批人才和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人和作品串连起来是历史，我们的学术理想要由作品来印证，不少问题可能在理论推导上分析得非常透彻，但是在实践中却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其次，文革后期，院校教育中中国画艺术教育的师资出现了一个空档。90年代中后期，一批青年教师成为中国画教学的骨干力量，在他们处于艺术的蜕变期、探索期的时候，他们已经承担传承重任了。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艺术家把创作的体验搬至课堂上，没有严格地把传统精华循序渐进地传授给学生，使得他们对中国画的基本要义和基础理论的认识出现缺失，又在他们三四年级时马上转入了探索创作实践，如此短的时间造成了我们的教育在四年本科毕业的培养目标上是为了培养艺术家等等。总结我们今天艺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思到我们昨天中国画教学的问题。再次，是要改变中国画的艺术传播方式，等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近年以来，各种各样的公益性活动很多，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需要艺术家参与，又由于搞活动就要有资金，而政府渠道不可能大量拨款，这就需要寻求一些赞助，但这种赞助是需要有回报的。这又容易造成许多应酬创作的轻率和艺术的低俗化倾向，粗制滥造，这对中国画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需要警醒的是，要把握好艺术市场的导向。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十分明确，其价值规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蚕食我们的审美取向，已经有理论家指出，当前的艺术学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正在合二为一，孰利孰弊，大家自有判断，但以目前市场的无序看，市场价值是不能等同于艺术价值的。以上所说的这几方面问题，如果得不到改进的话，中国画发展的状态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最后，我想谈点具体建议。我曾对全国政协书画室的领导同志说，前年一大批国家的文化部长聚会，共同签署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公约，其中中国是发起国，我很振奋。中华文化是一个古老而不曾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文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好了中国画的学问，就是做好了世界的学问，咱们政协书画室能不能牵头申报一个课题，就是中国画创作研究专项课题，能不能创立一个机制，跟财政要一点经费下来，组织一批专业骨干人员，制定一个中国画发展的规划，宏观点说是战略，小一点说是五年十年发展纲要。做一点实事，策划一批针对性强的选题，作为跟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研究的课题，出一批著作、批评文章，有计划地组织一批有潜力的（包括传统型、兼容型、现代型和实验型的艺术家）骨干艺术家，每人针对各自的研究实践方向，深入下去，力争在三到五年出一批系列成果，然后主动跟国际上专业美术组织进行交流，如果能把这个抓起来，十年二十年积累，相信会很有成果。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中国画的现状与思考

刘曦林

一、生态环境与画家自处

新时期以来，由于外部生态环境的改善，我们也遇到了新的外部问题。画家如何自处亦遇到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了，政治干预少了，艺术规律得以自由地进行探讨。同时，文化作为一种综合国力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期之一。我常常讲，现在画好画不好，不要怪别人，画家如何自处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二、中国画论争的继续与演化

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自由的生存空间，因此也有了中国画前途的自由论争，大家出于对中国画的关爱，各抒己见。中国画的论争从20世纪以来，每一次论争几乎都围绕着古今中外这样一个话题，都曾经非常简单地以古为旧，以西为新，甚至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新时期以来，我们开了不知多少会，讨论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熟悉，故不赘述。争论往往是因为“极端”引起，“极端”可能有局部的真理性，问题提得也非常尖锐，可以造就独特的艺术家，但对理论的研究，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对于教学来讲有它的弱点、缺点，甚至误导。

关于是否“穷途末路”的论争之后，张仃、吴冠中两位老先生关于笔墨的论争再起。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两位先生的论点，我再简单地回溯一下。1992年吴冠中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

傅抱石 《湘夫人》 118cm × 205.5cm 1954年 纸本设色 郭沫若纪念馆藏

表题为《笔墨等于零》的文章，主要的观点，认为“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情感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的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后来我把它简称为“零”论。他也有自己的前提，也强调了笔墨之外的很多方面，但是这个简单结论引起了震动和关注，当时我记得万青力先生首先展开了争论，写过一篇《无笔无墨等于零》，认为笔墨本身就是有内容的。张仃先生《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在1998年“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展”时出版的《现代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一书中发表。当时顾虑中国画和油画摆在一起会不会“吃亏”，但是感觉中国画并不弱。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宣读了张仃先生这篇文章，他批驳“革毛笔的命”、“笔墨等于零”的论点，肯定吴先生的油画是有笔墨的，提出了“中国画的识别与评价体系”问题，强调了笔墨的品性问题，认为“笔墨即使离开了物象和构成，也不等于零”，或者说，没有做成雕塑的泥巴也是有内容的。“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我将此简称为“底线论”。吴、张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出在世纪之交，中国画怎样往前走的两种不同选择，并不单纯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的个人经验代表了两种创作思路，在中外的关系上，在继承和变革的关系上强调了哪个方面，我想他们是各有侧重，然而在学术上却是不严谨的。此后，郎绍君、薛永年纷纷撰文讨论，据赵力忠统计有三百多篇。薛永年先生把笔墨分为材料、语言、精神三个层次。通过这样一个讨论，对笔墨的问题进一步地引起了思考、重视，但至今对此仍有异议。最近我看了《荣宝斋》发表的彭德关于20世纪山水画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浅薄的时代，能品多，而逸品缺席，认为山水画应该脱离主流文化，“成为这个疯狂世界的镇静剂”，“鼓励抑情节欲的当代隐士，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国策”。其中还有一段叫“奇怪的笔墨官司”，他认为笔墨是次要的，应该忘记手、笔、“看点在笔墨之外”。我认为自有其合理性，也有极端之处。

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宏观课题

近年来，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遇到了世界化和民族化这样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在经济世界化的热浪中，不同政治体系、不同国体的首脑频频握手，但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呼声，更加重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承认世界多元结构，多种文化价值。那么我们就产生这样一个课题，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的可能性的一种探讨，这可能是个难点，我们是在保护中生存，还是在创造中证实其生命的活力，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前几年，我注意到美国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著，他以文化和文明划分国家集团，未来世界的轴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他又认为，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学会和其他文明共处，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一直处于主导优势，西方试图将它的文化强加于别人。我也看到中国的社科界对这个论点的评价，认为他仍然没有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这样一个立场。世界各国人士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有人认为经济、军事仍是主要冲突。联合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联合国在2004年发表了一个文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但承认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存在，出现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也有国人主张，我们中国画是否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在调整的时候，西方仍然坚持着西方的话语霸权，特别是美国，美国对中国前卫艺术的支持，美国对中国艺术演化的关注，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在这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和我们自己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萨义德出版有《东方主义》，汤姆林森出版有《文化帝国主义》。后者认为，第三世界正以深广的民族精神，对人类文化远景进行思考，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的尴尬处境，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当西方文化中心论调整的时候，东方在崛起，中国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叫河清的青年学者写了《现代与后现代》一书，认为提倡文化的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当然，我们正在走向现代，民族艺术相应地要有时代性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在新时期，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文化背景，即后现代问题。对后现代的“后”字有不同的解释，后现代能否称为主义，后现代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我自己对后现代粗浅的认识有以下几点：一个是反权威的，反中心的，反传统的，但又有对传统的宽容，自身有矛盾；在哲学上是解构主义的；伴随着美国的强权文化，认为艺术是无国界的；主张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主张反叛、批判意识；另外主张科技手段现代化，多媒体，同时伴生着一种绘画、雕塑死亡论；后现代又主张无边无际的自由，人人都是艺术家，怎么搞都是艺术，但是也带来了艺术和非艺术界限的混乱；另外的特点就是消费性，快餐文化的大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